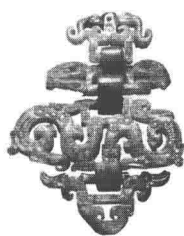


禅解
《五行篇》

弘音◎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自序

本书是朽人禅解系列著作中的一部，是“中国生命智慧系列丛书”之三。

《五行》篇是我国儒家早期经典著作，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五行》，更不知道其内容和思想。如果没有荀子在其著作中大为光火地发了一次脾气，我们可能根本连有个《五行》篇都不知道。这个谜团就这么一直持续到1973年。

1973年，我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这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改写了我国古代历史，更正了我们很多错误认识。还有很多谜团到现在也未能全部解开，比如古代如何制作薄如蝉翼的丝衣？湿润有弹性的不腐木乃伊如何保存到现在？等等。上述考古发掘的详细过程和资料网上都有，笔者不在此赘言。笔者要说的是，这次发掘发现了帛书《五行》篇，使得这一珍宝时隔两千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这次发现的帛书《五行》篇共五千四百余字，篇幅大体与《老子》相当；21年后，1994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的抢救性发掘再次令世人震惊，本次发掘有大量竹筒出土，里面又有《五行》篇！竹筒《五行》篇文字少很多，只有1300字左右。经山东大学庞朴先生研究，这就是失传的儒家《五行》篇，而且郭店竹筒《五行》篇是原著，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是原著加了注解的“扩展版《五行》篇”，这个注解在古经典中叫作“说”或“传”，是解释经的文字。至此，庞朴先生解开了存疑两千多年的谜团，实乃我国传统文化之一件幸事也！《五行》篇最终经国务院批准收录在《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典籍”。

本经的发现，使我们得以一窥失传了二千二百多年的古代文献，这是现代人独有的际遇。真的得感谢冥冥之中的保护神，历经二千多年的战乱、地震、洪水、盗墓、建设等活动，这些珍贵的资料能保留至今，实在是大不容易了。

《五行》篇一经发现，学者们即开始了文字考证、校对、训诂及释义等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由于《五行》篇思想深邃，言简义丰，区区一千三百余字的经文，却内含无量义，致使很多人读后如坠五里雾中，不明所以。这就是荀子所批评的“三无”现象：“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加之《五行》篇刚刚发现不久，目前仅仅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笔者查阅了相关研究文献，专门的著作仅限笔者所列的十几部，再有就是几十篇的单篇论文了，而且几乎都集中在“考据，辨义，训诂”等方面，几乎没有对《五行》全经的解读专著。故《五行》篇到目前为止仍然不为学界所广知，更别提普通百姓了。

古来很多著名的经文都是言简意赅的，这叫微言大义。比如《道德经》约五千余字；《金刚经》亦约五千一百余字；《心经》二百六十字；《太上感应篇》约一千二百字；《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约六百字，等等。这些经典，文字虽少，却是修道做人之无上宝典。本经亦然，仅仅 1393 字，但真正想读懂却并不那么容易，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三无”。其实，荀子的指责略带个人感情色彩，因为我国的古代经典都是微言大义的，没有啰啰嗦嗦的。比如号称天下第一经的《易经》，其卦辞和爻辞从没有长篇大论，都是寥寥数语，这才是经（通行本的《易经》其实是把经和传弄混了）。

但这也的确给现代人的理解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为古文之不传也久，肯拿出时间来细细研读经典的人也少，能讲授古经的人亦几乎不见，导致了我们的连自己祖宗的东西都看不懂了，真是可叹呜呼哀哉！呜呼惜哉！

《五行》篇之难读，也有其独特的原因。其一是，本经出土时间不长，仅有三十多年的时间。由于文物发掘与保护的特殊性，导致解读古文献的时间不到 30 年，绝大多数学者是在 21 世纪初，甚至是在 2010 年以后才得以一窥《五行》篇的文字的；其二是，《五行》篇失传了二千多年，在这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内容，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注本。这使得本经与其他经典不同，其他经典在历朝历代均有注本出现，其语言也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这有利于经典思想的传承。而本经跨越了二千多年的时空，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期间没有语言、注解的延续，这就给我们理解本经造成了很大困难（当然，不同朝代的注本中也不乏谬误之见）。

本经与《论语》《大学》和《中庸》的思想一脉相承，注重人的道德养成，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为了深入研究《五行》篇的思想内涵，为了使更多人了解古人的智慧，也为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笔者斗胆对《五行》篇进行浅释，希望能对读者学习领会儒家的精神、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有所帮助。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希大德批评指正。

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序言的最后部分应是感谢的内容，朽人也不免俗，在此罗列一下要感谢的人。朽人的系列著作能够得以出版，要感谢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朽人肯定是一个懵懂颡顽之人，是他们培养教育了我，才有了今天的系列著作；其次要感谢泰山医学院的领导和同事给予的鼓励和支持；第三要感谢我的夫人刘秋苓，是她包揽了全部家务，使我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写作；还要特别感谢的是中央编译出版社，朽人著作的出版，与该社编辑付出的辛劳是分不开的。还有要感谢未能提及的、出现在朽人生命中的所有的人和事，因为缺少其中任何

一个，也无法构成我的完整人生，是这些人和事，丰富并锻炼了朽人，故在此一并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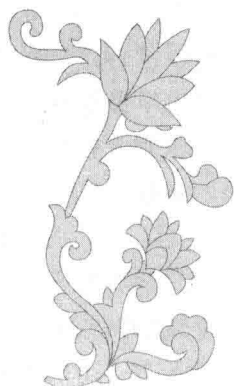
是为序。

弘音谨识于泰山坐忘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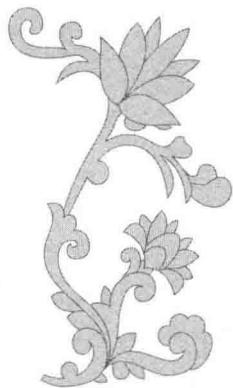
2016年5月



绪 论	001
《五行》篇竹简	027
《五行》篇经文	032
禅解篇	
经 1	035
经 2	049
经 3	054
经 4	061
经 5	069
经 6	076
经 7	087
经 8	095
经 9	108
经 10	116
经 11	119
经 12	127
经 13	131
经 14	137



经 15	141
经 16	145
经 17	150
经 18	155
经 19	160
经 20	165
经 21	167
跋 恢复传统文化是我们 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171
主要参考文献	175



绪论

一、何谓“五行”以及发现始末

荀况在《非十二子》中，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先秦各学派代表人物共十二人，他们是“它嚣、魏牟、陈仲、史醇、墨翟、宋铎、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和孟轲”。

《非十二子》的文风像极了《庄子》的《天下》篇，把以往各个学派都批了一通，荀子连用语也学庄子，语言辛辣不留情面，而且切中要害。庄子也不是见谁都批，他曾用极赞赏的语言推崇老子。荀子也一样照学不误，也在文中指出“只有孔子之学才是最正统的学问”。荀子对这十二子的批评几乎都是指名道姓的，只有对孔老夫子的孙子孔伋口下留情了，这在古代可以说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批判。荀子在批评子思、孟轲学派时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荀况这一段话的辞句很是激烈，但他只字未提所批评的“五行”说究竟是什么，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谜团。

一提到“五行”，人们头脑里出现的概念就是“金、木、水、火、土”的阴阳五行学说，此学说最早起源于黄老之学，在《黄帝内经》中有比较详细的阐述。然而，此“五行”是古人研究宇宙万物构成的哲学抽象概念，把万事万物的组成成分按照不同性质划分为五个基本“元素”，这个“五行”与荀子所指责的“五行”学说明不是一回事。

既然荀子指责的“五行”是“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那么，在子思和孟子的著作中，“五行”的思想就必会有所反映。然而，通观《中庸》和《孟子》，我们根本就找不到“金木水火土”的字样。很显然，荀子这里所说的“五行”不是“金、木、水、火、

土”之“五行”，而是“仿先君子”之言而“臆造”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明显是类似于《论语》那样的关于伦理道德之规范的思想，绝不是有关万物起源之思想。更何况“阴阳五行”学说的系统化，普遍采用“五行”为“金、木、水、火、土”的命名是在西汉时期才形成的，晚于孟子所处的时代。所以，无论如何，荀子指责的“五行”不是“阴阳五行”。

荀子所说的“五行”一直困扰了人们两千多年，没有人知道这“五行”是什么，指什么，更不知道其具体内容。很多人无奈地把它认为是“金木水火土”学说，但持此观点的人也无法说服自己。

山东大学的庞朴教授考证说：

头一个出来解谜的是一千多年后的唐人杨倞。杨注《荀子》“谓之五行”句说，“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他是根据什么来断定“五行”就是“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的，并没有交代，大概这在当时本是常识。例如孔颖达注《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句亦曰：“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威侮五行，亦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同样的了解，在汉人那里，则要更为简单而且直接得多，例如郑玄注《乐记》“道五常之行”句便干脆说：“五常，五行也。”

五种德行谓之五行，在先秦本来不乏其例。荀子谈乡饮酒的教化作用时，便曾说：“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荀子·乐论》）《吕氏春秋·孝行》也有：“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其亲，敢不敬乎？”准此想来，荀子所指责的子思孟轲之五行，也不会是早已存在了的 wuxing，而应该是有关德行的 wuheng；杨倞把它注为“仁义礼智信”，是有一定根据的。

应当说，庞朴教授的考证是令人信服的。梁启超也认为“五行”即为“五常”。在此基础上，郭沫若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五行”是“仁义礼智诚”。这两种观点在长沙马王堆和荆门郭店的古文物出土后得到了部分证实。其实，郭沫若的猜测是有其依据的，毕竟“诚”也是《中庸》和《孟子》的核心思想之一。

这里应多为梁启超先生着一些笔墨。梁先生的确独具慧眼，其学识之渊博通过此事即可见一斑矣。梁启超先生在解释《尚书·甘誓》中的“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时说：

后世注家多指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三正为建子建丑建寅……金木水火土五行，何得云威侮？又何从而威侮者？窃疑此文应解为威侮五种应行之道，怠弃三种正义。何者为五，何者为三，固无可考，然与后世五行说绝不相蒙，盖无疑。

此五行不知做何解……但绝非如后世之五行说，则可断言耳。（《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也就是说，梁先生依据“金、木、水、火、土”不能“威海”，也没有人能“威海”得了这五种基本元素，人所能违背和伤害的只能是“五种德行”，从而得出上古时期所说的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梁先生并没有看到《五行》篇出土，仅根据自己的学识就做出了这样高明的判断，真乃大家是也！那这“五行”是什么？梁先生囿于历史与考古资料之所限，推测也应该是像“五常”一样的道德伦理范畴。尽管梁先生推论为“五常”，而没能得出“仁义礼智圣”的结论，但这足以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1973年，长沙马王堆考古震惊了世界，在这座汉代的古墓里，一具不腐女尸令世人震惊，时隔两千多年依然栩栩如生，当真不可思议。与不腐女尸一同出土的还有大量的帛书经典，包括28种共12万字，其中有《周易》《老子》《丧服图》等。请注意，这不是竹简，而是帛书！帛远比竹简贵重、稀有，可见墓主人一定是个爱学习的人，其生前一定是常读经典，视若珍宝，所以才用帛书经典来陪葬。其中就有《五行》篇。帛书《五行》没有篇名，共19段，182行，每行约三十字，共计5400字。最早提出这篇文字即荀子所说的“五行”的学者是庞朴教授，他分析了整篇文字后认为，全部文字可分为“经”和“说”两大部分，“经”即经文，“说”即对经文的解释。而且，庞朴教授更是独具慧眼地直接将其命名为《五行》。

关于此命名，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如四川大学的魏启鹏教授就认为应该叫作《德行》，因其经文中有多处“德之行”的字样。魏启鹏教授的提法也不无道理，毕竟经文中强调了“德之行”，却忽视了一个很明显事实：荀子批评时直接说的是“谓之五行”，根本没说“谓之德行”。直到1993年10月，荆门市博物馆为了抢救被盗墓者挖掘的古墓，发掘了位于郭店的楚国大墓。本次发掘又发现了竹简的《五行》经文，而且经首直接题有“五行”二字，这无疑证明庞朴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

据考证，郭店竹简《老子》的抄写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6—278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老子》大约抄写在公元前206—180年，也就是说郭店竹简《五行》比马王堆帛书《五行》要早一百年左右。按常理来讲，被墓主人视若珍宝的经典应形成于墓主人在世之前的一段时间，不太可能是当时形成的，换句话说，《五行》篇的形成一定早于墓主人下葬的时间。早多少呢？估计不会少于50—100年。如果这样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五行》篇应该是在公元前350—400年左右就已经广泛流传了。换句话说，《五行》也是成书于“轴心时代”的。轴心时代指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出现的思想大爆炸时期，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这一时期十分短暂，但几乎全部的、影响人类的伟大思想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是一个困扰学界的不解之谜。

郭店竹简的《五行》篇与长沙马王堆的帛书《五行》篇不同，竹简《五行》只有“经”部，没有“说”部，故文字少了很多，只有一千二百字左右。据此，庞朴教授推

论，这恰恰说明了《五行》的发展过程：竹简《五行》篇是初期文献，或许刚刚形成不久；到了帛书《五行》篇，就已经有人给它作注了。至此，庞朴教授解开了困扰学界两千多年的谜团，该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赞同。

其后，有几位学者做了后续的工作，如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做了文字校对，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为子思所作，而“说”为孟子所作的观点，认为只有如此，才与荀子所说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意思完全吻合。日本的汉学家池田知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而，《五行》篇的发现毕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故其思想价值目前还不为广大世人所认识。

二、“五行”思想

本节将要讨论《五行》的主将要思想及其来龙去脉。《五行》的主要思想是“仁义礼智圣”。全经围绕着这五个要素而展开，论述了“五行”的重要意义，乃至如何达成“五行”，直至指出成为圣贤的道路。

那么，《五行》篇的作者究竟是谁呢？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本经。

多数学者倾向于《五行》篇的作者是子思，根据当然是荀子的“子思唱之”这句话。尽管多数人认可这个结论，但实际上这个结论也不是一点疑问也没有。“唱”通“倡”，有提倡、首倡、首唱之意，但所指并不一定是作者。比如，《大学》为曾子所做，《中庸》为子思所做，都被古人收录在《礼记》之中，一千多年来，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直到北宋时期的二程（程颢和程颐）把它们从《礼记》中单独提出来，嗣后朱熹加以注释，与《论语》《孟子》合并在一起并称之为“四书”才引起前所未有的重视。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是“二程唱之，朱子和之”。

也有人从《五行》篇的行文风格来推测其作者为子思。但这也同样存在疑问，因为没有谁的文风不能被模仿，模仿得惟妙惟肖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大学》和《中庸》，其文风极为相像，但其作者并不是同一个人。

尽管如此，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五行》篇的作者是谁之前，我们只能依据荀子的这句话认定作者就是子思，毕竟除此而外再没有更为直接的证据了。

荀子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就告诉我们《五行》篇是二人极力倡导的，那么，它的思想也必是二人的主体思想，不会有其他可能。故研究二子的思想就成为正确理解《五行》篇的突破口，这可以减少因文字缺如或文字通假等情形带来的误解。

思孟学派的主要思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心性学说，认为人性本善，不从天来，人人具有四端之心；二是认为人可以修养自己的道德，要养自己的浩然正气，提出“反身以诚”“反求诸己”，从而达到人皆可为尧舜的理想境界；三是主张实行德治，

提倡以仁义治国、民重君轻、与民同乐的理念。

《五行》篇的思想，与思孟学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心性论的提出，是思孟学派尤其是孟子的一大贡献，它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仁”的学说，使得儒家也更加重视心性的开发，改变了以往儒家过多地关注世间法的形象，从而在哲学的巅峰占有了一席之地。所以，从《五行》篇的思想来看，该经是“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可能性极大。这可能是比前面论及的两个证据更为直接的证据。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鲤的儿子，年幼的时候跟随孔子学习，孔子过世后，跟随其弟子曾子学习。众所周知，曾子是继承孔子学问的大家，是夫子门下最优秀者。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确认子思是得到了他爷爷的真传的。事实上，子思也的确出类拔萃，光大了他爷爷的学说。

子思在儒学的学术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最终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民族达两千余年。

据传，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之多，可惜大多都已经亡佚，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看到了，能否像《五行》篇这样再次幸运地被考古所发现谁也说不准，但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何把握《五行》篇的思想？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儒学的传承和仅存的子思的有限文字入手，这可能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儒家学说由孔子（前551—前479年）创立。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他整理古代文献，删定《诗》《书》，编撰《春秋》，其思想主要为“仁”“孝悌”“忠恕”“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尽管他承认人“生而知之”，但更强调人的能动性，如“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等思想，也强调“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政治上，主张“正名”，应“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提倡“德治”和施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其学说在后代弟子中分成几个派别，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

孔子歿后，他的学说主要由其弟子曾子（前505—前436年）继承。曾子，名参，字子舆，以“孝”著称，名言有“吾日三省吾身”“忠恕而已”“慎终追远”等。

接下来就是子思（前483—前402年）了。子思名伋，现存的子思著作有《中庸》《表记》《坊记》和《缁衣》等。其最主要的思想莫过于“中庸”思想了。何谓中庸？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不偏不倚，允执厥中。只要人人都实践中庸之道，整个天地就会和谐太平，人类大同，万物化生，欣欣向荣。这就是子思的中庸之道。

子思的另一个思想是“诚”。子思说：“诚者，天下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意思是，如果人心能保持真实无妄的状态，人就能把握真理。

再接下来就是孟子（约前 372—前 289 年）和荀子（约前 313—前 238 年）。这两个人是儒家学派两个大分支的代表人物。

孟子，名轲，字子舆。子思弟子之弟子，继承了子思思想。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力倡王者应施仁政。他认为人皆有仁义礼智的天赋的道德意识，人皆有“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他还提出人应养“浩然之气”，提倡养心寡欲，要求人要“反求诸己”，从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荀子，名况，时人尊称为卿，著名教育家，其《劝学篇》千古流传。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他的思想与孟子相反，主张人性本恶，所谓的善是伪善。他还对先秦思想家的学说提出了批评。尽管荀子的思想与孟子不同，但这恰好成了我们研究《五行》篇的重要参考。

要想准确把握《五行》篇的思想，笔者认为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一位大儒的思想也必须参考，这个人就是明朝的王阳明（1472—1529 年）。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心学创始人，他主张“心明”则“理明”，“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他认为人通过“诚”就能达到“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就可以成为圣人：“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故必要的参考文献主要有《论语》《诗经》《大学》《中庸》《孟子》《荀子》《传习录》和《史记》。此外，既然是禅解，那么还需参考佛家的经典，佛家经典讲伦理道德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小乘佛教经典和律藏中。

总之，《五行》篇的思想是和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笔者觉得应该是：《五行》篇的宗旨和目的就是教导我们要向圣人学习，目标是做圣人。为达此目的，通篇讲述的是如何养成圆满的圣人人格。这一点与人们对儒家的既定印象或许稍有不同，我们总是习惯认为儒家是人世的，但本经打破了这个思维定式：本经通篇几乎没有讲什么“为政”，没有讲什么“学而优则仕”，也没有讲什么“治国、平天下”，讲的都是我们如何修炼自己、完善自己的人格。这与《大学》的修学功夫十分相像，这也说明了“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是有其理由和根据的。

因此，《五行》篇的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成圣”的主张。其实，“人人能成为圣贤”的思想早在孔子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如“未有如我好学者也”“斯仁至矣”等，或明显或暗示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努力，也可以成为圣人。但孔子毕竟没有鲜明、直接地提出

“成圣”的提法。本经则凸显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成圣”，并将其列为“五行”的最后一“行”，表示通过我们的努力，完全可以达成圣人之人格，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与佛家的“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人人都有佛性，原本都是佛”的思想一致。也正是这一概念的提出，儒家思想才最终完成了升华，在哲学的巅峰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二，明确指出“五行”是为我们的本性所具有。“五行”之德不外来，“非由外铄我也者”，是我们的本性，本来就有，所以叫“德之行”。这与佛家所说的“如蒸砂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名热砂。何以故？此非饭本，砂石成故”的思想完全一致：原本是砂石，如何能成为香喷喷的米饭？你的本性如不具备“五行”，任你怎么修炼也不会拥有，更不可能成为圣人。

第三，指出凡夫皆应该成为“志士”，皆应树立向圣贤学习的人生理想和壮志。我们身陷滚滚红尘，流浪生死，迷惑颠倒，这令圣贤痛彻心扉，惋惜不已。故圣贤者自然而然要救度我们这些愚痴之人。本经通篇都在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要立大志，树雄心，向圣贤学习，要我们成圣，这才是圣贤者所致力、所倾心的伟大的教育事业。这与诸佛菩萨慈悲度化众生，用尽种种方便，欲令众生皆发菩提心是一样的。

第四，指明了成圣之路。如何成圣？本经告诉我们首先要完善我们的人格，人格都不完善，成圣就只是纸上谈兵。如何成人，达成完满的人格？本经指出了具体的修行路径，如“闻君子道”“见贤思齐”“恭敬供养师长”“积善成德”“积功累德”等方法，直至最后达成“金声玉振的集大成者”，就成为圣人了。这也与佛家的“戒定慧”“闻思修”“六波罗蜜”等思想完全相同。我们只要脚踏实地，认真实践，人格完成，即成佛也！

以上就是《五行》篇的核心思想。

三、荀子何怒

在了解《五行》篇的思想后，我们自然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荀子言辞如此激烈地对其加以指责呢？

的确，如庄子批评的惠施，荀子也批评了，而且这样的批评是合情合理的，毕竟人整天毫无意义地玄辩对于实际生活和工作没有一点用处，对于修身养性和悟道更是自设了重重障碍。因此，荀子对惠施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仔细研读了《五行》篇以后，有点觉得荀子之批评过火了些，《五行》篇的思想总体上看与儒家的主张没有太大差异，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同为儒家后人的荀子，他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不知道谈论了多少次“仁义礼智”等问题！为什么自己谈可以，《五行》讲就不可以呢？荀子对之大动肝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除了荀子的《非十二子》之外，我们找不到更多的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唯一的解决途径只有仔细阅读荀子的这段话：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子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分析一下不难发现，荀子的指责主要有：

1. 想效法古圣先贤创立学说，却对圣贤的思想不甚了了（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
2. 自命志大才高，知识渊博（材剧志大，闻见杂博）；
3. 所持学说一点新意也没有，不过是依照既有的理论体系推出自己的学说（案往旧造说）；
4. 词语生僻，含义隐幽，令人难解（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即庞朴教授所说的“三无现象”）；
5. 夸大其词，自我吹嘘（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6. 假借圣人之言，蒙蔽后人（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

荀子的指责只此六条而已，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荀子的批评除了第三条和第四条是直接针对《五行》篇以外，其余各条与《五行》篇的思想并没有直接关系。

即使是这两条直接针对《五行》篇的意见，荀子也并没有说《五行》篇思想是错误的，这一点尤其重要。这说明，同作为儒家思想继承者的荀子，尽管他认为《五行》篇词语生僻，含义隐幽，令人难解，没有一点新意，但他也还是承认《五行》篇思想与夫子的思想是一致的，两者并无矛盾。毕竟荀子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大谈特谈“仁义礼智”，没有理由不让“五行”也谈“仁义礼智”。章太炎曾深入考察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思孟学派的思想并无不妥，那么荀子所说的“五行”学说也应该无错，“虽子思倡之亦无损，荀卿何讥焉？”意思是：尽管“五行”幽僻难解，子思提倡也没有什么不对，荀子为什么要鸡蛋里挑骨头呢？在《五行》篇未出土之时，章太炎仅凭对思孟思想的研究就能得出这样具有先见之明的结论，的确令人吃惊！可见，真学者和假学者的区别有多大。

庞朴教授认为，让荀子生气的是“案往旧造说”，也就是说，庞朴教授认为思孟二人“依照既有的思想理论体系推出自己学说”的做法令荀子十分不满。笔者却以为这一论断有待商榷。何以见得呢？这要仔细分析一下“案往旧造说”的含义是什么。“往旧”何指？思孟按谁的“往旧”而“造说”？此无它，指的一定是思孟的老师。思孟的老师是谁？不就是孔子和曾子吗？那么，学生丰富和发展老师的思想理论体系有什么不对吗？荀子不也是继承儒家的学说并加以发挥的吗？继承老师的思想体系有错吗？

佛陀在涅槃前，他的弟子曾请教佛祖：以后佛陀不在了，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某人说的是不是佛法呢？佛陀开示弟子说：“要以‘四依法’来判断是否是正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意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看看，佛陀肯定地指出，是否正法不是看是谁说的，不管他地位多高、财势多大，也不是看他说得是否动听，这些都不是判断标准。换句话说，学生的说法只要是对的，按照“往旧造说”也是可以的。所以惹荀子生气的不可能是这一条，毕竟荀子也是在先贤的基础上才做出自己的成就的，谁能离得了前人所奠定的基础呢？

笔者认为，让荀子大为光火的是其余四条，比如水平不高还自我吹嘘，比如“三无”现象等。而据笔者分析，可能最令荀子不能容忍的是第六条，这种“假圣人之言”而推行自己思想的“行径”是“极其恶劣”的，传统的儒家文人是很难接受这样的行为的，这也就难怪荀子大光其火了。庞朴教授注意到了“案往旧造说”和“三无”现象，但却没有注意到这几条，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

然而，作为后人，平心而论，我们没有进行仲裁的资格，我们连《五行》篇是什么才刚刚弄明白，两千多年前的的是是非非，我们怎么能够明了呢？起码我们现在没有发现思孟学派假借圣人之言而推行自己思想之实的证据。所以，关于这个争议，我们只能暂且束之高阁了。我们只要知道《五行》篇的思想并无错误，可以教导我们做人做事，提升我们的伦理道德水平，对我们修身养性有指导意义就足够了。我们这样去看待《五行》篇，也不枉“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了。

四、三教本一体

既然本经是儒家经典，为什么要用佛家的思想来注释呢？

这是一般人的疑问。原因何在呢？

其实原因极其简单：不管我们用什么思想体系来注释某一经文，只要它能准确地帮助我们理解经意，那么，什么样的注释都是好的注解。笔者用佛典来阐释《五行》篇，至少有以下三个考虑。

其一，三教原本一家。

儒释道三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呈三足鼎立的局面，谁也缺不了。少了任何一个，这个鼎就无法站立，就支撑不起中华文明这杆大旗。

其实，三教从根上说原本一体，只是创立者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我认为文中子、王重阳、张紫阳、张三丰、憨山大师和莲池大师等人的“三教合一”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三教都从大道而生，其根本为一家。陆象山说：

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千百世之上以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

但三教合一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新教，也不是要排出一二三的次序后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从而不再争论。三教合一是指教义之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如儒家偏重世间的学问，就为佛家和道家所吸收；佛家的缘起、性空等理论非常完美，可以补儒家和道家之偏；道家的太极功夫可以和静坐完美地结合起来，等等，这才是三教合一。这样的三教合一对于健全完善社会规范、提升道德修养、涵养我们的灵性都将是大有裨益的，是构建幸福快乐、和谐美好的社会所必须的。

佛法是出世间法，儒家是世间法，按常理两者好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怎么会是一体的呢？是的，佛法是出世间法，但出世间不离世间，此为真正的出世间。佛教的最终目的是成佛，但成佛必须先成人。不成人而能成佛，断无此理！因此太虚大师说：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

雍正皇帝是帝王当中少有的有实证的实修之士，他说“朕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他对于三教的看法是：

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贯通，于是人各异心，心各异见。慕道者谓佛不知道之尊，向佛者谓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闢二氏以为异端。怀挟私心，纷争角胜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论，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则外略行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导人于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诱掖奖勤，有一不引人为善哉？昔宋文帝，问侍中何尚之曰：“六经本是济俗，若性灵真要，则以佛经为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则吾坐致太平矣。”何尚之对曰：“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则百人和睦；持此风教，以周寰区，则编户亿千，仁人百万。而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斯言也，盖以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佛教之化贪吝，诱贤良，其旨亦本于此，苟信而从之，洵可以型方训俗，而为致君泽民之大助。其任意诋毁，妄捏为杨墨之道之论者，皆未见颜色，失平之譬说也。（《雍正御制佛教大典序》）

这里，雍正皇帝不厌其烦地述说了三教原本一家的道理，争论三教谁高谁低的原因是“不能豁然贯通”“人各异心”而已。以一个皇帝之尊，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令人十分佩服。

印光大师是佛门高僧，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他却从没有以佛教凌驾于其他二教之上。他一生提倡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说：

大矣哉！吾心本具之道！妙矣哉！吾心固有之法！……三教圣人，依此心性，各垂教迹，广导群萌。由是尼山挾诚明之奥，作修齐治平之轨；柱史说道德之经，

陈长生久视之术；大觉世尊，称法界性，示真如心，演背尘合觉之道，立不生不灭之宗。虽深浅大小不同，世出世间有异，要皆不外即吾心本具之理，以发挥演畅之，普令含识，称性起修，即修显性，消原无之幻，复本有之天真，永出迷途，诞登觉岸而后已也。（《安士全书序》）

藕益智旭大师说：

三教原本一家。大道之在人心，古今唯此一理，非佛祖圣贤所得私也。统乎至异，汇乎至同，非儒释道所能局也。克实论之，道非世间，非出世间，而以道入真，则名出世；以道入俗，则名世间。真与俗皆迹也，迹不离道，而执迹以言道，则道隐。（《灵峰宗论》）

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设。（《灵峰宗论》）

正因为三教皆从心设教，那么，三教的根本任务就都是教人“不昧本心而已（《灵峰宗论》）。”

王阳明也持此观点，他的学生黄勉之问：

“‘思无邪’一言，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义？”

先生曰：“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便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卷下》）

哪一家学派的学问能离得开真善美？能离得开觉正净？能离得开戒定慧？根本不能！而这个“思无邪”就是真善美，就是觉正净，就是戒定慧。

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也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主张：他的教下，除了《道德经》以外，还必须奉持佛教的《心经》、儒家的《孝经》两部经典。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紫阳真人是道教南宗祖师，与王重阳齐名，他的《悟真篇》极富盛名，以诗歌形式写就，千百年来备受修道者重视。世人皆知紫阳真人为道教宗师，却很少知道他的佛学功底也相当深厚，请看他的十二首《西江月》，哪一首不是佛法？

（一）

妄想不须强灭，真如何必希求。本源自性佛齐修，迷悟岂拘先后。
悟则刹那成佛，迷则万劫沦流。若能一念契真修，灭尽恒沙罪垢。

（二）

本自无生无灭，强将生灭区分。只如罪福亦何根，妙体何曾增损。
我有一轮明镜，从来只为蒙分。今朝磨莹照乾坤，万象超然难隐。

（三）

我性入诸佛性，诸方佛性皆然。亭亭蟾影照寒泉，一月千潭普现。